

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

(下)

何輯五

迎吳入川獲得諒解

楊森將軍之重情誼，從迎接吳佩孚入川一事中，獲得證明。吳佩孚自鄂省敗退，北遁河南，又復敗北，至此，真的窮無所歸，楊森將軍以吳有兩次助其入川之誼，乃發電歡迎之。但其時的楊將軍，已是國民革命二十軍軍長，吳是被國民革命軍打倒的敵軍首領。私情公誼，尖銳衝突，楊的處理方式是這樣的：他決定迎吳之後，即電告 蔣總司令，保證吳之入川，完全沒有政治關係，如有越軌行動，他負完全責任。吳佩孚自河南歷盡翻山越嶺之苦，到達四川東境，楊則親乘軍艦至巫山迎迓，依然執禮甚恭。 蔣公對於楊氏的為吳請命，處理也煞費苦心。論公，楊有推倒武漢共黨控制操縱的國民黨政府之功績，對他的請求，不給他核准，不近情理；論私，吳楊有過去的深厚關係，楊既不顧本身的政治地位，而悍然迎吳，則安知其不為報德而受吳佩孚之利用？時楊氏的兵力已有十餘萬之多，這一點不能不加以注意。惟時局未靖，故對楊問題，只好暫時的容忍，徐謀妥善的處理。

所謂楊森將軍有助於推倒武漢反革命政府

，經過是這樣的。國民革命軍十五年七月北伐，先定兩湖，在廣州的國民政府接着遷至武漢。在容共政策仍在繼續施行期間，國民黨深受共產黨的滲透，黨政與民運機關被把持的不少。國際共黨以鮑羅廷任代表團長，用一分為二方法，把國民黨分成左右兩派，以「革命者向左靠」的口號，吸引對共黨陰謀認識不清的國民黨同志，而以汪精衛為左派領袖，由鮑羅廷控制了領袖狂強烈的汪某。鮑羅廷是土耳其對希臘戰爭時的蘇俄代表團團長，他深知中國不能像土耳其一樣產生一個革命領袖，故對 蔣總司令北伐統一的行動竭力加以阻撓。國民政府既遷武漢， 蔣總司令親率大軍自湘入贛，與另一軍閥孫傳芳（本為吳佩孚部下的師長）鏖戰於南昌一帶，武漢政府乃施行所謂「失敗主義」。

對 蔣公的在贛大軍，不輸軍餉，不發援兵，使 蔣公的北伐統一大業不能成功。這便是共黨所謂失敗主義，意思就是說：「我不能成功，使你也不能成功」，其計至毒。但是 蔣公的東征行動與廣東東路軍的北征行動，迅速發展，孫傳芳和張作霖的聯軍，大敗虧輸，一直退到徐州以北。而所謂武漢政府，反在 蔣公大軍光復京

滬之際，汪精衛竟與陳獨秀聯銜通電，儼然攘奪北伐軍功；潛伏在第六軍中的共黨分子，竟在國民革命軍江右軍攻入南京之後，突入外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等機關，妄圖製造排外空氣，要外國人來阻撓北伐。愛國的國民黨高級同志，乃發起清黨運動，把混跡在革命團體中的共黨分子，一律清除，正式定都南京。故十六年四月以後，南京與武漢成對立之勢。

合擊武漢赤色政權

共黨對楊子惠將軍的拉攏，未因朱德的離去楊將軍而中斷。武漢共黨主持對楊氏聯絡的頭目是吳匪玉章。吳匪在赤色的武漢政府中，提出議案，撤免劉湘、賴心輝的職務，交楊子惠將軍查辦，並在是年四月，派另一共黨分子高語罕到楊氏軍中任政治部主任。高語罕剛到宜昌，就得到楊軍東下的消息，還發生了一場很有趣味的誤會。原來，楊氏對朱匪德的陰謀之被發現，對共黨已深惡痛絕。但楊氏對共匪的態度，似乎非常的含蓄，共匪方面並未發現破綻，故仍想盡拉攏的辦法，認為可以生效。其時愛國、愛黨、反共的國民黨重要川籍同志謝持先後派石青陽、黃復生

、盧師諦等至萬縣聯絡，楊氏自接任二十軍軍長以後，仍派陳抱一為代表，經常奔走於萬縣南昌之間，直接與 蔣公聯繫，接受命令。 蔣公亦派二期黃埔畢業生，楊森將軍的同鄉段遠謀為代表，攜手書及勞軍費十萬元報聘。故楊氏之政治趨向，實際上早已胸有成竹，絕非共黨分子所能左右。這一點，楊氏一生抓得很緊，也和其他多變的川軍將領不同。當高語罕到達宜昌時，正值楊軍出川和夏斗寅軍東進。夏斗寅所部為鄂軍，他是一位反共健將，其東進被武漢方面認為是一種威脅；而楊森部隊之出川，被武漢赤色政府認作對夏斗寅部之跟踪追擊，也認為對楊氏之聯絡成功。故高語罕對此情勢，認為武漢政府應出兵攻擊夏斗寅部，與楊部成兩面夾擊之勢。不知楊森和夏斗寅的行動，是出於 蔣公的命令，他們以同一目的——攻取武漢，而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此一方式，即楊軍對夏軍作攻擊狀，夏軍作不支後退狀。這一齣瞞天過海的雙簧戲，竟然完全瞞過了那一股赤色與糊塗的武漢分子，成為革命運動的佳話。

蔣公對楊氏為吳佩孚請命庇護，由於上述因素，得到特別的寬容，即以此故。楊氏大軍既出川東下，一面與夏斗寅聯名向南京中央建議通緝武漢共匪及附匪首要，一面兵分三路，向沔陽、潛江、天門進攻，其天門一路可以趨孝感而切斷平漢鐵路，潛江一路可以切斷湘鄂之間的交通，在軍略上都饒有意義。故武漢政府對此形勢的發展頗感應付的困難，不久即告垮台。故武漢被國際共黨操縱的政府之提早結束，楊軍東下，厥功甚大。

安居川東從事建設

但是，吳佩孚久居楊氏防區的白帝城，仍為各方所矚目，而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荒城二郎特派駐滬特務機關長入川訪吳佩孚，表示願以經費、軍械等之援助，使吳佩孚重整旗鼓，尤使國民政府滋多疑慮。楊氏既以軍力推倒武漢政府，南京與武漢即言歸於好， 蔣公為了表示護黨初衷的光明意志，也自行引退。孫傳芳在江北的殘部乘隙渡江，乃有龍潭的鏖戰。孫軍潰退後，國民政府登覺楊森容吳佩孚於川東之不妥，乃於十六年十月命令楊森、劉湘迅速逮捕吳佩孚，但吳仍安寓白帝城，民國十七年一月， 蔣公復職，中央政治會議通過免除楊森的二十軍軍長的職務，所部二十軍歸劉湘、劉文輝統率。實際上，吳佩孚在白帝城居住，雖各方代表絡繹而來，但吳並不理會，故楊氏對吳向中央之保證是有效的。至此，吳見各方對楊森之誤會日深，乃遷居鄧錫侯防區，中央對楊之誤解始告解除。可是中央把二十軍歸劉湘、劉文輝指揮的命令，劉湘認為是併吞楊軍的好機會，乃於十二月發動對楊軍的攻擊。國民政府令楊不得參加戰爭，楊頗尊重；而劉湘則請國民政府下令討伐楊森，他們兩人對國民政府的態度，始終不同。翌年（十八年）三月，劉文輝組織四川省政府完成，劉湘之攻擊目標轉到劉文輝身上，二劉時時衝突，楊反安居川東，從事地方建設。劉文輝與劉湘是叔姪，但是為了地盤的爭奪，攻戰不已，是亦川局變化之特色。其時劉湘的軍力，已為蜀中各軍之冠；蜀中殷富及人口之多，又為全國各省之冠；距離海口已遠

，長江航路至宜昌僅能通中型船舶，宜昌以上的蜀江則僅通特製鋼甲小輪，且兩岸多山，即有名三峽之險。昔人論四川形勢，有「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灘瀨之虞」，是一個易守難攻的形勢。故 蔣公的高瞻遠矚，早已把四川看作抗日戰爭的最後根據地，早期的看重楊森，就含有這種意義。其時中日關係，日益緊張，我國所受的壓力更日益沉重， 蔣公之加緊剿滅贛南共匪，建設交通路線和發展工業，都是奠定抗日之基礎。對於川局，自然是 蔣公最為關切之事，子惠之實力既不如劉湘，安定四川的責任，就落在劉湘的雙肩。劉湘在川軍將領中對國家前途也是比較更關切的人，故其接受二十一軍軍長的職務，是中央與劉湘間的關係基礎之奠定。前面我曾經提到送達二十一軍軍長任命狀給劉湘的事，我不過躬逢其盛罷了。在我和劉湘將軍本人及其重要幹部多次接觸中，我了解了這批川軍將領對國家的愛護熱忱之高，並不亞於其他將領，我當時懷疑其愛國真誠者只有一個劉文輝。在大陸變色前夕，劉文輝所表現，真是無險對國家，可是他現在又如何呢？無愛國心者，決沒有好下場的。

痛剿窮追西竄共軍

吳佩孚的遷出楊氏防區，恢復了楊氏和中央的關係；楊氏尊重國民政府命令，不參加川軍的內戰，只埋頭於川東的地方建設，恢復了 蔣委員長對楊氏的信心。其時， 蔣委員長的工作重心之一是剿滅贛南共匪老巢。第五次圍剿的成功，擊破了贛南匪區的防禦，殘匪西竄，鑽湖南國

軍之際，西入貴州，掠黔滇毗連地區，繞道西康東南部，竄入川西，意欲與川東北的徐匪向前殘匪相合，但未能成功，只好溯岷江而上，逾左担山而入甘肅，最後與陝北土共劉志丹相合。在這次跟蹤進擊的大軍行動中，楊氏又表現他的勇敢和果斷的才能。

徐匪向前本在鄂西北一帶。在第四次圍剿中，蔣公採取剪其羽翼的軍略，先把贛南以外的各股共匪剿除。徐匪在國軍痛擊之下，只好逾大巴山，竄至川東北，這是二十三年的事。其時蜀中劉湘與劉文輝戰鬥的結果，劉文輝敗北，讓出成都，避向川西與康東。楊氏在二劉劇戰中，始終駐防川北與川東六縣，即南充、廣安、渠縣、營川、蓬安、岳池，一方訓練部隊，一面建設。徐匪入川，正當楊氏的防區。劉湘既勝劉文輝，最高當局乃畀以四川剿匪總司令之職，劉則以第四路剿匪總指揮委楊森，負責嘉陵江左岸防務，徐匪撲營山慘敗，退守巴中，而楊則猛烈追擊，徐匪無奈，央朱德函楊，以和平共存來誘楊，而楊置之不理，繼續猛攻，至二十四年春而全部收平。

在第四次圍剿成功後，緊接着便是第五次圍剿，消滅贛南匪巢，廣昌一戰，主力被殲，殘匪西竄，有由黔入川之勢。最高當局盱衡情勢，決調楊部移駐川南，集中於瀘州，擊匪於慶符、筠連、高縣等地，先鋒達貴州之畢節。匪竄滇東北，轉入康東南，楊部輕軍窮追，岷尾猛襲，越大相嶺、小相嶺。朱匪德只好迫入寶興縣之硃砂溪，這是四面環山的袋形峽谷，楊部夏炯師長困匪

在此一絕地者凡五晝夜，大部就殲，朱匪僅率一小部分翻越海拔萬尺以上之巴朗山而免脫，不敢再走大路，由小徑竄至岷江上游之懋功縣。時徐匪已潰散，會師無望，而楊部仍岷尾而至，無可奈何，只好改向川甘邊境之毛兒蓋，逃向陝北，匪的「陣中新聞」，特向殘匪警告：注意楊軍之行動。由此可知匪畏楊之深。時最高當局已至成都，親自督剿殘匪，聞楊部沿路捷訊，特召見其駐蓉辦事處長，予以嘉勉，並以慰勞金空投懋功縣城。故剿匪戰爭，論黔康川邊區之追擊，楊氏之功，實首屈一指，故深得最高當局之嘉許與信任，也是楊氏對國家建立汗馬功勞的最重要部分，是民國二十四年的事，楊和蔣公會面，也在此時。

楊家將的忠勇義烈

楊氏對國家貢獻，尚有數事，值得特別一提：其一、西安事變，中央主張討伐，楊則秣馬厲兵，準備向陝境出擊，以側翼響應中央軍。其二、抗日軍興，川軍之首先響應抗戰者即為楊部。其三、二十六年十月，楊部初抵寶山縣蘆漢濱前線陣地，日軍乘新舊交替，施以猛襲，楊軍誓死不却，陣地賴以保全，由是川軍得勇於為國犧牲之令譽。其四、國軍自滬京轉進，楊部一直担任擁護的任務，克盡厥職。其五、二十七年一月，劉湘病逝於漢，楊氏率同川中軍政紳商領袖，通電全國，擁護抗戰，願供所有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等等的資源，安定抗戰根據地的人心和秩序。其六、武漢淪陷後，第二期抗戰開始，楊氏任

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兼二十七集團軍司令，主要任務是保衛長沙，與敵人決戰於湘鄂贛丘陵區。二十八年至三十年冬的長沙三次大捷，楊部都担任主要任務；尤其三十年冬守禦新牆河正面之役，是楊部夏炯師的王超奎營長負禦敵之責，敵人以最猛烈砲火轟擊王營，陣地全毀後，則以破牆頹垣為掩護，以致無一人生還，其壯烈犧牲，實在太原五百完人之前。三十三年，湘省戰事南移，楊部始改任桂省防禦戰。是年多解除軍職，改任貴州省政府主席，其親手訓練之二十軍，仍由其姪孫楊幹才任軍長，始終是最出力的剿匪將領之一，三十八年在共軍南下的皖南戰役中，力戰不屈，自殺殉國。

日軍侵黔出主省政

楊之出任貴州省主席，是適在日軍突擊隊深入黔南之後，時楊部主力在桂西。我前面說過最高當局不任軍人為黔省主席，是安定滇桂兩省的用心，及日軍輕騎至黔，頗以黔主席如不諳軍事，對捍衛抗戰基地四川的安全，頗有影響，故以楊氏繼吳鼎昌氏之後，出主黔政，但仍解除其軍職，仍然重視滇桂的安定，我們試想像當時的西南全局，抗戰基地是四川，黔省主席是川人，雖已解除軍職，但其重要部隊則在廣西西部，緩急仍可指揮。這種人事部署的精密，可以說達到最高點了。

當楊氏接篆黔省主席職務時，我仍然是貴州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和貴陽市長。黔省府此次改組，僅及主席，並不是省府主席與所有委員廳

處長一概另有任用，或同時申請辭職，所以我們並無與吳主席共同進退的必要。反之，貴州是我的家鄉，安定家鄉，富庶家鄉，從文教建設以開通民知而健全體格；農礦建設以餘國計民生，交通建設以暢通貨運，都是我一貫的主張，而且慘淡經營，已不下十餘年，自問我已苦幹實幹中，盡了我最大的責任，也已小有成就，尚待繼續努力。因此，中央並沒調我離開現職的暗示或明令，我也不作辭職的表示，這不是我戀棧，而是要繼續為我的家鄉服務。

注重建設幾項措施

但是，楊氏過去是非常注意地方建設和提倡教育和運動的。在成都，在萬縣，他都認真建設地方，經費無着時，則發動其部隊參加軍工築路，他的建設精神，當時深深地引起川省其他軍人的不滿，如楊好接近知識分子，而委以秘書之職，其他軍人乃譏其「祕書成連，侈談建設」；而楊則反譏他們：「只知爭奪地盤，而不知建設地方。坦白的說，楊之建設地方的精神，是值得我們贊許的。照常理說，楊氏和我的理想，完全符合，我們之間，應該徹底合作，協力推進地方建設，纔合正理。但是相處了一段時間過後，我漸漸感覺到我要和楊氏合作，中間的問題，着實不簡單。

楊氏接篆不久，即指吳前主席為垂拱而治而非之，乃提出其治黔方針，以發展交通為第一要務，提倡軍工建築縣道省道，以與國道配合，完成西南公路交通網；主張擴大造林、保持水土

；禁種鴉片、改進農產；提倡清晨體操運動，名之曰「復興操」；倡導穿短衣運動，以改變社會風氣；改良苗民生活，提倡漢苗通婚等，是他舉大者的施政原則。中國官場，舊時本有新任指責前任之不合，而另創新辦法，下一新任又指前任之不合，改創新法，實與再前任無異。如此成為政治的循環，不知政治成績是一種政策實施的積累，如果不是有真正的大錯誤，不宜輕言改革，此輩規曹隨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楊氏不是老官僚出身，我想不會表現這一手，但是他初當主席，不免對「表現一手」的特別心切，亦未可知。

新政舊政事實如此

平心而論，楊氏所要在黔實施的新政，極大多數都是舊政，如他所主張的交通建設，我在奉命任西南特派員以後，我的全副精力，都在交通建設方面，楊氏主黔政約有四年，他任內建設的公路似乎只有一二條，也是老計劃。他所提倡的軍工作路，只是一句響亮的口號，那時候他的舊部不在貴州，駐防貴州的國軍為數極少，並非楊主席所能指揮，他能指揮的只有幾個（大約是四個）保安隊，但是原有任務已極沉重，實在無法再要他們擔任本職以外的築路。至於其他各點，除「復興操」與「苗漢通婚」外，都不是楊氏的新政策，而是原有的政策。我舉雙手贊成復興操，由於黔人中鴉片毒者甚多，晨起最難，身體健康，也頗受其害，矯治之法，除勒令戒絕鴉片外，只有提倡晨操的一條途徑。可是實行起來便問題重重了：第一、勤儉的農工商或公教人員，他們本

有早起操作的習慣，要他們早起，根本不必命令，但在他早起後的工作時從事強制運動，却也未必歡迎。第二、黑籍中人或初離黑籍的人，要他們早起，殊非一紙命令所能辦到。因此如何讓他們早起，應有具體辦法，但不早起並不犯法，他不能加以強迫。第三、早操是一種強身的動作，有一套適合的操法，這需要有人教，需要先養成師資，交由民衆教育機關實行。既是全省普遍的提倡早操，顧名思義，應普及於鄉村；但是貴州省教育經費困難，因陋就簡的民衆教育館，一縣一個有的地方還很困難。楊氏這一理想雖然很有意義，但是實施起來，十分困難，要長期的不斷的努力，纔可逐漸達到目的，絕非一紙命令即可完成。至於漢苗通婚，前人並非不知道，而且也在努力進行，這也是一項長期的教育和經濟性的工作。都市地區附近的苗胞逐漸減少，就是漢苗同化的結果，但這仍是長期教育等方面的成效。最顯著事例：就是苗胞對漢胞的懷疑態度很深，事事都以為不懷好意。這也難怪，因為與苗胞接觸最多的是漢商，從事商業這種職業的人，重信講義的固然很多，但是施行詐欺手段者實不在少數。苗胞對漢人之不信任，大體上由此而起。因此，要使苗漢之間互相信賴，當從雙方的教育方面着手，當從建立商譽着手，當從改良苗胞生產方面着手。也決不是一紙命令所能辦得到的。

文官管理似有隔膜

楊主席對於貴州省的建設，真也十分可佩。他在三十五年出席制憲國大以後，還親自到東北

和台灣考察，企圖採用日本對東北與台灣的建設，施諸貴州，用心可謂良苦！而不知貴州沒有建設資金，地面甚為貧苦，地下則甚為富裕，非有大量資金，無法進行，我十多年致力於貴州建設，只有窮對付，以聊勝於無為原則的苦幹，實在出於萬不得已。平心而論，和楊主席做朋友，真是再好也沒有了，講義氣，重善諾，古之俠士，殊亦不過如此。但是和他共同做事，那就有許多難言之處了。楊主席是軍人出身，做文官沒有很多經驗，對文官機關的管理，似乎頗多隔閡。部隊用命令行事，承上級意思，可以貫徹到最下層的組織；作戰時，如有必要，部隊長也可斟酌情況，親率部隊參加某一方面的戰鬥。但政府機關則不然，以省的地位來說，是居於中央與縣之間，承轉地位極為重要。省政府在不牴觸中央法令之下，可以自己立法，但必須得議會的同意外和中央的批准，並不具有絕對的權威。省政府所屬廳處室會，雖然都在省政府管轄之下，但各有組織法與辦事權限，省政府可以在法令範圍內要

它們做什麼事，但省主席可不必越過他們直接去做什麼事，這便是分層負責的原則。由部隊長出身的楊主席，以管理軍隊的方法來管理政府機關，有時候便要捱隔難行了。例如：他和黔省保安司令韓文煥同志之間，不知爲了什麼原因，鬧得極不愉快。韓文煥給人，黃埔軍校第三期出身，在黔東共匪爲亂時曾以保安團單獨的力量予以剿平，深得最高當局嘉許，至此遭受撤職查辦的處分。

我和楊主席相處了一段時間，逐漸知道他對地方建設什麼都由他自己來辦的原則，一若在成都、萬縣和川北的例子，因此我逐漸用旁觀的態度，作有限的幫助，而且還辭去貴陽市長等的兼職，不三月楊氏又電呈中央令我任建設廳長。楊氏對地方建設，的確非常熱心，但是並無整套的理想，更沒有具體的辦法，只有想到什麼辦什麼，朋友之間閑談，我下以八個字的批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料這句話傳入楊氏耳中。一日，楊在省府會議中，時我出巡各縣未參加會議

，他特別提出這件事。他說：何廳長說我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試問頭痛不醫頭，腳痛不醫腳，那怎樣一個醫法啊？他的坦率真誠，大率類此。

書法渾厚言行合一

楊氏主黔政三年多，我和他的關係，始終保持着和諧的合作，我的宗旨只是建設我的故鄉，完全是服務桑梓的至誠，他人做的工作成績，我決不掠美；我的工作成績，算在別人的帳上，我也決不申辯。楊主席這種一把抓的作風，揆其意似乎爲了名，所以我以從旁協助的態度，促成其工作之發展，只要我有功可盡，絕不推諉；反之，我也決不爭着要什麼，免生疑慮。我和他謹慎的相處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他對我似乎相當滿意，曾經自動的親筆爲我寫了光明磊落人和政通八個字送給我。他的書法，似乎出入於劉石庵、錢南園之間，請讀者恕我辨別力不足，但一種渾厚天成之氣氛，使人感覺得到的。西南軍人之能書法者，實在不多見，而楊氏殆其中之佼佼者歟！

我和楊主席交往時間不久，所知道生平事蹟也不多，但有數點，值得特別一提，作爲本文之結束：

第一、他從小文武兼習，從古籍中領悟到民族大義，從簡要的時事知識中感到革命救國的必要。故一聞革命大義，即欣然參加，由辛亥而討袁，而護國而推倒武漢赤化政權而激擊逃竄共匪而抵抗裝備優勢的日軍，無役不從，且都卓著勳績，可稱爲西南軍人中言行合一的完善之楷模。



本文作者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廳長時楊森將軍親書

「光明磊落人和政通」八字勳勉。

第二、他接受最高當局 蔣公的指揮，出於至誠。他和夏斗寅唱雙簧戲推倒武漢政府，僅僅憑 蔣公的一封手書的信件而不是命令，但楊氏視同命令，移師東下，卒達驅逐俄僑，促成寧漢合作。民國二十五年雙十二事變，張楊召開全國知名人士會議，劉湘仍派其幕中的共黨分子參加，楊則始終嚴拒，他如朱德之被驅逐，吳玉章聯絡之不接受，徐向前企圖苟延殘喘之不容許，竄抵川邊之朱德的邀擊，都是反共的舉犖大端。大丈夫慎擇出處，進退，而堅執不二，楊氏有之矣。

重義守信力倡體育

第三、舊誼之尊重，也是楊氏人格中的重要部分。吳佩孚兩次助楊入川，重整旗鼓，對楊有大德。他國民革命討吳之役，楊擁部十餘萬眾，苟欲相助，對吳未始無效，但楊氏堅持其固有的政治立場，決不相助；及其無立足之地，則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安頓吳佩孚於劉備託孤處之白帝城。但他對 蔣公保證吳絕不再作政治活動，是十足兌現的。

楊氏若對國民革命不忠實，則當時孫傳芳尚在江北負隅，華北與東北均在張作霖掌握中，而蜀中局勢，又復紛亂如麻，楊吳聯合，仍可搗亂於一時，但楊並不作此打算，而堅持其忠於國民革命之立場。故楊之招待吳佩孚，我們也可看作監視吳佩孚。 蔣公對此，似已心會其意，故楊之善待吳佩孚於窮途末路之際，實饒有俠義氣概。他在萬縣向英國軍艦開火，為國家爭國格，為國民洩義憤，尤為世人所樂道。凡人之處事，常

情理法兼顧，而綜結於理法，依我的經驗，楊主席對「情」特重，這又是他為人處世的特點。

第四、兵工從事於地方建設，為楊氏之另一特別作風，為其他西南軍人所不及者，楊得吳佩孚之助，克成都，任四川軍務善後督理，即着手推行建設，成都至灌縣的川省第一條公路，就是楊在那時候開關的，創立成都市政機關，擬建成都為四川模範都市，郊區公路及市內公園，也是在此時建設的。楊曾任重慶督辦，曾建郊區公路與江岸碼頭，曾擬鑿通嘉陵江與長江間之頸部。卸任貴州主席轉任重慶市長，又擬在重慶市與江北縣間建築鐵橋，以便往來。此外，在萬縣，在川北亦多建設，財力不足，則以兵工充之。此為楊在貴州提倡兵工建設之由來，蓋亦經驗之談，而不知時異勢不同也。

楊之由貴州省主席調任重慶市長，是由於戡亂局勢逆轉之故。時川省投機軍人已在醞釀降匪，中央乃命楊兼任重慶衛戍司令。是年十二月，四川省專門投機的軍人，劉文輝，鄧錫侯這批投降專家已正式投匪。楊氏與劉湘系的軍人川省主席王陵基等相約退至川滇康邊區，重整旗鼓，徐圖恢復。時執政的國民黨 蔣總裁已至台灣，電召楊氏來台，籌商軍國大計，未及返防，大陸即告變色。因留台，專事提倡運動，以為強國之本，因任全國體育協會會長。家居新店，在其附近，受到所有鄰居的珍重，楊氏亦盡其全力，協助發展國民教育。

家規極嚴誤於刀圭

最後，我要略談楊氏的家庭，楊氏出身於舊式男性中心社會，他就是家庭的主宰，任何人都得聽他的支配。體格特別強健，雖屆耄耋，而髮色如墨，健步如飛，望之如六十許人。常參加登山運動，雖青年壯漢，咸落其後，職是之故，舊愛新歡，除元配外亦常聚散，而家規極嚴，蓋以治軍之法治家也。所歡中如願求去者，亦聽之而不強留，贈以資斧使各得其所。故家庭分子雖雜，但仍和睦如恆，子女就我所知約共卅一人，各有深造，為國家社會盡其心力，饒有父風。是殆舊社會中之新家庭也。

楊氏對新智識非常的吸收，熟入中有勸其不用割除手續亦可痊癒者，楊氏則謂其不知享受現代化之醫藥。以楊之體格，善加保養，享壽百年，絕無問題。但以求好心切，小恙輒求根治，願受割治之醫藥，經多次後，元氣大傷，卒以不能抵抗而殞命。以九十六高年而辭世，從「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觀之，固無所謂。但國家正在致力於反攻復國運動，為期已迫在眉睫。四川乃至西南大局之號召與收拾，有賴年高德劭而聲望極重之大老者實多。楊公之過分自愛其生命，卒至欲益反損，自損其壽，使復國運動中對西南的收復蒙受重大的損失，能不為之扼腕！

訂閱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

〇七二四八〇